

宗教信仰空间的分布与选址因素探析

——以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为例

秦弋然^{1,2}

(1.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2. 爱知大学 中国研究科, 日本 名古屋 4610003)

内容摘要: 以时间和空间为视角, 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可分为明代城内寺院、清代城内寺院和城外寺院三类, 这三类寺院分布于今天兰州城市内外的各个区域, 而它们的选址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人口、地理、历史和风水四方面因素的影响。作为佛教信仰空间的城市寺院, 其分布与选址具有明显的特征, 从中也可窥见明清时期兰州城市信仰空间和职能的泛化与城市人口信仰的世俗化倾向。

关键词: 明清时期; 兰州; 城市寺院; 选址因素; 信仰空间

中图分类号: K92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 (2019) 01-0154-10

寺院作为佛教信仰的重要空间载体, 不仅是沟通佛教理想世界与世俗社会的纽带, 也是构成城市文化景观和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兰州城市佛教的发展, 早在两汉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时, 金城作为当时丝路重镇之一, 就有佛教僧侣来往此地。其后十六国时期, 在河陇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 如前秦、后秦、前凉、北凉、西秦、西凉、后凉的汉人和氐、羌、匈奴等少数民族也不乏崇信佛教者。到了隋唐时期, 政局平稳, 百姓生活富足, 兰州历史上才出现了第一所佛教寺院——庄严寺。贞观九年(635), 高昌王子鞠伯雅之子文泰从长安返回高昌时在兰州修建宝塔寺, 即后来的木塔寺。其后, 又在兰州敕建普照寺。安史之乱后, 兰州陷于吐蕃, 后又被西夏占领, 直到北宋初才被收复。南宋时, 兰州又为西夏与金不断争夺, 持续经受战乱。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情况在史料中的记载也不甚清晰, 惟一可以明确的是, 唐代时在此修建的庄严、宝塔和普照三所大寺并没有在战乱中被毁, 而其之所以能够在近五百年的风雨飘摇中得以保存, 也当与后代的持续维修密切相关。元代时, 藏传佛教盛行, 13世纪时萨班·

贡噶坚赞在前往凉州(今武威)与阔端会面时, 途经今永登县连城镇北的石屏山, 见此地瑞气缭绕, 众菩萨显光, 故在此建噶林寺, 此即为“藏传佛教传到兰州地区之始”^{[1][17]}。至元间, 曾对唐时修建的宝塔寺和庄严寺进行了修缮, 元仁宗时, 又在五泉山兴建皇庆寺。总体而言, 明清之前兰州的佛教发展起步较早, 但受制于社会因素, 频繁的战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佛教寺院的建设, 故而并没有形成太大规模, 仅在唐代时修建了规模较大的寺院。同时, 由于兰州在明清以前的城市定位以边地军事重地为主, 文化较为落后, 故而在历史上也没有诞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高僧大德, 也缺乏僧人提出具有创新性的教理教义, 再加之寺院频繁动荡, 兴废不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兰州城市百姓的佛教信仰, 故而在史料中对于明清之前兰州城市百姓的佛教信仰也缺少相关资料进行佐证。

明清以来,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职能的丰富, 兰州作为一省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 而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佛寺在这一时期的兰州城市发展中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佛教、道教和其他民间宗教建筑

收稿日期: 2017-10-16

作者简介: 秦弋然(1991-), 女, 甘肃兰州人, 南开大学与爱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从事中国佛教史研究。

在城内交错分布，鳞次栉比，不仅影响了明清时期兰州城市的日常生活，也共同构建出明清时期兰州多元而复杂的宗教信仰画卷。透过这一时期作为文化景观的寺院，深入探讨明清时期兰州城的物质与精神空间结构，对于还原重构明清时期兰州城的信仰结构体系，并探讨这一体系与明清时期社会的互动关系，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回顾目前的学术成果，在通史方面著作数量较多，郭厚安、陈忠实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展开论述，对兰州城市在明清时期的发展问题有所提及；邓明则以丰富的史料为支撑，详细梳理了兰州历史的发展脉络，并对不同时期兰州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解析。兰州城市历史的建制沿革和地理位置问题，始终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安守仁的文章从明代兰州卫的设置对明代兰州城垣做了详细的说明，梁德辉对兰州城市建置的历史沿革进行爬梳整理，赵一匡则从政治、经济角度简要介绍了兰州府的整体概况。还有不少学者从城市建设角度展开讨论，赵世英全面介绍了明清时期兰州城历经过的多次整修和扩建，邓明则对明清时期在兰州建立的城堡进行了梳理，还有党瑜、牛晓燕的几篇文章，也从理论上对学界广泛质疑的明清时期兰州的一些地名进行了研究考述和重新定位。李清凌一文著作时间虽早，但对明代西北地区的藏传和汉传佛教进行了论述，并对汉传佛教的发展特点做了概括，意义非常重大。宋法仁也对明肃王对兰州城市的建制，特别是对寺观的建设做出的贡献进行了研讨。综上所述，目前学界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对于兰州城市历史的通论、历史地理的考异和城市发展与社会关系的探究上，而较少从城市史和宗教史的角度进行综合考量，故笔者不揣浅陋，通过爬梳和整理史料，探讨明清兰州城市寺院的基本分布情况，并通过对影响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选址的因素进行探究和分析，以此考察明清时期兰州城信仰空间的整体特征，展现出明清时期兰州城市信仰职能世俗化与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一、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的空间分布

明清时期，宗教信仰因有利于巩固统治、强化秩序、安定社会、教化民众之功用，继续受到

统治者重视。宗教信仰被提升到与文化教育相同的高度，朱元璋曾表示：“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14]46} 出于这样的考虑，明清两代的统治者对于佛教大多采取了比较宽和的统治政策，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一时期兰州的城市寺院经历了多次重修和新建，佛教信仰空间得到了很大发展。

在此，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的教派归属问题。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数量较多，虽然在明清时期的相关史料中很少明确提及明清时期兰州佛寺所属的佛教派系，但由于当时兰州城所处的陇中地区在地理区划上归属于陕西布政司，在政治和经济上也主要受到陇东地区的影响，故而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兰州佛教划入陇东南汉传佛教文化片区^{[15]145}，因此，从当时地区佛教文化发展的大体环境来看，明清时期的兰州城市寺院主体属汉传者。另一方面，结合当时文人墨客对兰州城市佛寺环境的描述记述，这些寺院无论是在寺院建筑形式还是其内部供奉的神祇，都具有强烈而明显的汉传佛教特色。当然，由于兰州地处西北地区，深受周边少数民族影响，故而在明清时期的兰州城中也确实存在着信奉藏传佛教的寺院。如五泉山嘛呢寺，因寺院内有嘛呢转轮而得名，嘛呢，即藏传佛教“六字明咒”的简称；又如华林寺，史籍中就明确记载其“正统十年建，今番僧居。”^{[16]146} 遗憾的是，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关于明清时期兰州城市藏传佛教寺院的基本概况目前仍有很大空白，故而在本文中笔者的关注点还是以汉传佛教寺院为主。

(一) 明代兰州城内寺院分布

据载，明代兰州城内的寺院数量较少，集中分布于城市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其中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者，仅有庄严寺、普照寺、嘉福寺三所寺院。由于明代政府对于佛教始终秉持着既提倡保护，又限制整顿的态度^{[17]2}，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有感于元代佞佛而引发的威胁世俗政权统治、管理混乱、僧侣良莠不齐等种种弊端，充分认识到了佛教势力过于膨胀的危险性，因而非常重视国家政权对于佛教的管理。洪武二十四年

(1391)六月,他颁布诏令,规定“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者一所,并而居之”^{[18]3109};七月,又下令“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听令归并成寺,其原非寺额,创立庵堂寺院名色并行革去”^{[19]63},正是在这种佛教寺院合并政策的要求下,一些较小规模寺院的寺僧、寺产等都被归入了附近的几所大寺之中,而其原有的寺院建筑则由于僧去寺空而难以避免地陷入衰败,这也应能够从一定程度解释何以在这一时期,兰州城内见诸史料的寺院仅有规模较大的三所。

1. 庄严寺。在明代兰州城北鼓楼西侧,据专家考证,其址大约在今兰州市城关区大众巷附近^{[3]5}。相传此处旧为隋末金城校尉薛举居所,唐武德二年(619)敕建为庄严寺,门额上有元代名僧、书法家释溥光所书“敕大庄严禅院”匾。明成化十六年(1480)重修。重修后,庄严寺内建筑主要有山门、前殿、大雄殿和五佛殿,其中正殿大雄殿内供奉的佛像生动飘逸,“衣褶细叠,迎风欲举”,谓之“塑绝”,墙上绘制的观音像“所披白衣覆首至足,俨然纱縠,柳枝经久,翠色如新”,栩栩如生,谓之“画绝”^{[20]102},这二者与溥光匾额合称为庄严寺之“三绝”。

2. 普照寺。在明代兰州城北部,其址大体为今兰州市少年宫(兰园)所在地。普照寺又名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金泰和时重修。明代的普照寺形制齐备,规模宏大,自山门后由南向北沿中轴线依次排列金刚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法轮殿、藏经楼,东西两侧还有配殿、钟鼓楼等建筑。寺院山门上有元代匾额“敕赐大普照寺”,金刚殿、天王殿内“塑像极伟梧”,大雄宝殿内供奉三尊佛像,后壁上所绘大悲观音像“可见者十一头四十二臂,手头有三层,而手各有眼,执持法物甚备”^{[21]8},蔚为壮观。大雄宝殿后的法轮殿内有木质法轮一架,有学者据轮前明肃宪王题额“法轮恒转”“雨花金界”考证其曾于明万历时重修^{[3]6}。藏经楼中有经藏五千余卷,亦应为肃王施财印制,存于寺中。普照寺西侧有鼓楼,与其相对的东侧钟楼内有一直径六尺、高九尺、重达万斤的铁钟,为金泰和时所铸,“兰州

城内金石之存者,此最古也”^{[21]8}。经过明代的大规模修缮,普照寺最终成为兰州城内气势最为恢弘的佛教寺院。

3. 嘉福寺。又名木塔寺,在明代兰州城西北部,其址大体在今兰州市城关区木塔巷至永昌路北段附近。嘉福寺旧名宝塔寺,始建于唐贞观九年(635),元至元间重修,后毁于战火。明正統九年(1444),肃王捐资,命承奉田荣在宝塔寺旧址重建此寺,造“浮图一十三级”^{[22]379},并在四周建造护殿,形成了寺院以塔为中心的建筑格局。塔南为大雄宝殿,殿左为尊胜殿,殿右为准提殿,再向南为山门,塔北为毗卢阁、药师殿、文殊殿、普贤殿。天顺四年(1460),肃王出金铸钟置于寺中,钟高一尺,口宽四尺,钟身有十六字铭文和七字梵文。成化三年(1467),“宝塔寺自是始更名为嘉福也”^{[24]12①}。嘉靖三十五年(1556),肃王因“木塔屡毁屡修”^{[24]12②},再次发金重修,使壮丽的宝塔与宽阔的寺院相得益彰,寺中的木塔“珠璣四覆,玉贝圍通,铃语风闻,神光夜彻”^{[3]8},与城外北山上的白塔遥相呼应。

(二) 清代兰州城内寺院分布

总体而言,清前期和中期,兰州城内的大型佛教寺院以重建、复修旧有建筑为主,这是由于这些寺院大多位于城内,受到地理位置的局限,无法进行规模上的扩大,因而这一时期的庄严寺、普照寺、嘉福寺等都只是在明代寺院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小规模的改扩建。而另一方面,一些散布在城内的较小规模寺院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康熙)兰州志》《(乾隆)皋兰县志》《(乾隆)甘肃通志》《(道光)兰州府志》等地方志和《兰州古今注》《陇右金石录》《留素堂诗删》等时人文集记载,清代兰州城内较小规模的佛教建筑主要有:

广福寺:又名高壁寺,在南关,即在今兰州市城关区白银路东段附近。

昙云寺:在城东新关,即在今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附近。

接引寺:在东关,即在今兰州市城关区东方红广场西侧附近。

靛园寺:在南园,即在今兰州市城关区民主

① 明人黄志洪曾撰有《敕赐大嘉福寺记》一文记载此事,今碑已佚,仅可从《兰州古今碑刻》一书中略知一二。

② 明肃昭王朱缙炯曾为此事撰有重修碑记。

西路以南。

重新寺：在城南崇文门（清道光时更名为皋兰门）外，即在今兰州市城关区皋兰路南段附近。

观音堂：在新关，即在今兰州市城关区金昌北路与秦安路交叉口附近以西。

具体来看，清代兰州城内的大型寺院建筑主要有庄严寺、华林寺、普照寺、嘉福寺、白衣寺塔院等。

庄严寺：仅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于寺院后增建了照壁，“以手拍之，其声如琴”，清人蒋薰题诗《大庄严寺》云：“净界琉璃地，如临舍卫城。长廊沈画影，古壁应琴声。”^{[25]303}乾隆四十六年（1781）庄严寺毁于兵火，不复存在。

普照寺：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进行重修，使之成为习仪祝厘之所^{[22]379}。康熙时，甘肃巡抚刘斗又主持重修此寺，庙宇殿堂宝相庄严，时人有《题兰州普照寺》诗：“前朝留古刹，象教演河东，碧殿临梁苑，洪钟出汉宫。廊回香树外，经转法轮中，满壁虎头画，沧洲意不穷。”^{[25]303}

嘉福寺：清康熙初年，嘉福寺木塔因香烛不慎毁于火，经过重修，并在“木塔下建佛殿九楹，其上作八棱形，层累直上，塔顶一室，广阔仅八九尺，凡为级十有三，高至十五六丈，重阁矗虚，复道凌空。”^{[21]10}然而据史料记载，此时的嘉福寺木塔已经不复明代的辉煌，“较旧制为卑小矣。”^{[20]103}直到清中后期，嘉福寺“不戒于火，遂丧”，惟有木塔模型仍存于寺中^{[21]10}。

白衣寺塔院：位于清代兰州城东关，初建时间不详，有学者推测其始建于明中期，清初时白衣寺塔院内有子塔，其他建筑还有白衣菩萨殿、观音阁、文昌宫、伽蓝祠、慈母宫等。据残存碑文可知，白衣寺塔曾于明崇祯四年（1631）和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重修，特别是第二次由官民共同出资重修多子塔、白衣寺大殿并对后院慈母宫中的塑像施以金妆^{[23]173-175①}，使之成为清中后期兰州城内一处规模较大的寺院建筑群。相较于前代，在清代地方志中出现的新修较大规模寺院是白衣寺塔院。

乾隆四十六年（1781），“苏四十三事件”爆

发，兰州城“所有关厢内庵观寺院俱被放火烧毁”^{[26]311}，寺院的重修翻修也就此陷入低潮。直到清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丰富，兰州城内外寺院的重修和翻修才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这时的重修和翻修在更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对于寺院的侵吞和改造，一些辉煌的梵刹此时也再难以重现其旧日的荣光。

（三）明清时期兰州城郊寺院

兰州作为一个受到地理因素制约的条带状城市，城内空间在明清时期已经基本达到了饱和，“北有黄河水，南有五泉山，中夹兰州城，城小如弹丸……官署居其半，以半为市闾。”^{[27]121}正是由于这样的地理特征，再加上明之前兰州城外已经分布有一些寺宇，在明清时期就逐渐形成了城南五泉山和城北北山这样两大寺院分布密集区。

1. 城南五泉山寺院区。城南五泉山分布的主要寺宇是崇庆寺。崇庆寺旧名五泉寺，明洪武五年（1372）敕建，永乐时由肃王出资重修，更名为崇庆寺。崇庆寺依五泉山山势而建，中麓依次为金刚殿、大雄殿、轮藏殿、大悲殿和奎文阁，东麓则建有五龙宫、地藏庵和卧佛殿。天顺六年（1462）和嘉靖十四年（1535），在肃王府的主持下，乡耆、嘉福寺住持、崇庆寺住持和各地信士共同出资两次重修崇庆寺千佛阁，使宝相顿生，佛堂更加恢弘。

清前期，崇庆寺依旧沿袭着明代的寺院建筑布局，只依山势在寺院西侧增建了燃灯寺、酒仙庙、慈母宫、大佛殿、清辉阁和地处最高处的三教洞，又另在山东麓建老君庵，山西麓建嘛呢寺、二郎庙，至此，五泉山形成了以崇庆寺为中心、东中西三路并存的寺院建筑群。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泉山崇庆寺建筑物群毁于苏四十三事件，后经嘉庆、道光两朝时的重修，逐渐得以恢复。道光十五年（1835），甘肃省布政使梁章钜曾游览此地，见“琳宫紺宇，蔚然巨观”，欣然留句：“佛地本无边，看排闥层层，紫塞千峰平槛立；清泉不能浊，笑出山滚滚，黄河九曲抱城来”^{[28]60}。清同治六年（1867），崇庆寺再次毁于战火，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才在兰州翰

① 有《重修白衣寺塔院碑记》和《重修白衣寺多子塔暨大殿前后墙垣台阶、院后娘娘殿金妆神像、补塑山子一切匠工物料使用账目开列碑记》见于《兰州古今碑刻》一书。

林刘尔忻的主持下得以修复,使之成为一处集山灵水秀和人文传统于一体的寺院建筑群。

2.城北北山寺院区。兰州城郊的另一个寺院集中区是黄河以北的北山,即今兰州城北白塔山。明正统十三年(1448),太监刘永诚监镇甘凉,遂在此“起梵宫,建僧居,永为金城之胜境”,是为白塔禅院。嘉靖二十六年(1547),兰州人郑子敖、杜均铠等人主持重修白塔,“上启国藩宗室,辅相官僚以资助之,下及白叟黄童、乡社方民,以力兴之。”^{[23]106①}次年,工程完工,白塔禅院内外焕然一新。万历二十年(1592),郡宪诸公发金,再次重修白塔禅院,在其北建地藏殿,其南的山下建玉皇阁。

入清之后,对白塔禅院的修复情况史料中少有记载,但到了清中后期,随着兰州成为甘肃一省之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城市定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百姓的经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再加之这一时期,佛教世俗化的趋势愈发强烈,大量佛教信徒组织涌现,这就为修复白塔禅院提供了客观和主观的双重保证。清中后期对白塔禅院旧有建筑的修复次数较多,其中规模较大者共有三次:乾隆十八年(1753),观音会信士共98人与白塔禅院住持张守逵等人共同出资重修奎星阁、文昌宫、三星殿,“倾圯者而轮焕焉,剥落者而金碧焉”^{[23]104②};乾隆三十八年(1773),山西开阳府太平县学生董充及张开蒙等七名信士共同出资补修禅院前悬楼,内塑文殊、观音、普贤神像^{[23]113③};光绪三十年(1904),兰州府僧纲司魏可文等人出资又重修地藏殿明真宫百子洞,“鸠工庀材,易剥落以涂丹,换暗淡为金碧”^{[23]139④}。

清代在白塔禅院附近又新修了不少佛教建筑。

康熙五十五年(1716)兵部右侍郎长白绰奇等人主持在白塔禅院以西建慈恩寺,“又于山之东南建文昌宫、魁星阁及诸绀殿、回廊、复道……又为浮屠合其尖,使之卓然特立”,先后兴建白塔寺正殿、准提菩萨后殿、地藏菩萨前楼等建筑,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方才完工^{[23]101⑤}。康熙五十七年(1718),“大中丞绰公”于地藏殿西侧建观音水帘洞,乾隆四十二年(1777),观音会信士48人与白塔禅院住持静宁等人进行重修,在“坳洼坻岸之处围以回廊,补以窄磴,曲曲折折极其奥趣,恍若普陀之佳境”^{[23]112⑥},寺院建筑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在兰州城外黄河以北的北山上围绕白塔禅院形成了新的更大规模的佛教寺院建筑群。

此外,清代在黄河以北的金城关附近还创建了金山寺,其址约在今兰州市北金城关附近。金山寺初建时间不详,因时代久远早已坍塌,仅有其址。康熙四十年(1701)功德主胡承禄及其妻毛氏一家在此大兴土木,使“东西两峰各有佛舍”,“又为楼以远眺,亭以憩息”^{[23]283⑦},使之成为白塔山西一处新兴的佛教寺院,并与既有的白塔禅院及其附属建筑共同构成了城郊北山寺院区。

二、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选址的影响因素

任何宗教建筑的修建,归根结底的目的都在于如何能够使其本身得到最大化的信仰群体,从而实现其宗教、信仰和祭祀的功能。

(一) 人口因素

人口是信仰的基础,任何寺宇都需要一定的

①曾有明人名“星海道人”者撰有《重修白塔寺记》一文记载此事,文中说:“乡彦郑子敖者,乐善之人也,节登其所,睹之不堪,谓众曰:‘可新之。吾辈无其善工,何为之善者乎!’……起自嘉靖丁未春,迄于戊申夏浣,俱已落成。”

②清人段绍先撰《重修白塔山奎阁、文宫、三星殿记》一文记载此事,文中说:“住持僧守逵谋于会众而重修之,补颓葺坏,仍旧鼎新……则人之人是庙者,靡不肃瞻拜而思敬焉。”

③清人董充撰《补修北塔山三大士楼记》一文记载此事,文中说:“金城黄河迤北之北塔山巅禅院前,旧建悬楼三楹,中塑文殊、观音、普贤神像……于是年孟秋鸠工庀材,经营期间匝月告竣。时神像基址焕然改观矣,登临者咸啧啧为之称,请勒石以纪之。”

④见清人戴光圻撰《重修白塔山空藏寺明真宫百子洞碑记》:“壬寅重九日,公余闲暇,偕素识之陈、高二君挈壶榼、备肴核,同往寺中恣游眺……于是三心泥首前虔心祷祝……次年余果举一男……令各出五十金以为倡……爱捐一腋之微,复藉众擎之举,醴得四百余金。”

⑤见清人长白绰奇撰《修建北山慈恩寺碑记》:“乃为之买地、置磨,俾其岁有所入以供伊蒲之饌,招僧真彦住持西寺,真璘住持塔院。琅函碧磬,暮鼓晨钟,皆足以发人猛省。”

⑥见清人陈简撰《重修白塔山水莲观音洞记》:“康熙戊戌,大中丞绰公于吾兰白塔山之巅,地藏佛事之西卜地一区,创建救苦观音洞天……今善士王依、徐美、俞清烈等慨然任重修之责。”

⑦清人胡承禄撰有《创建金山寺记》一文记载此事,今碑已佚,仅可从《兰州古今碑刻》一书中略知一二。

信仰人群作为支撑,对于城乡寺宇来说,在居民区的附近就近布设寺院最有利于信仰群体前往祭拜,从而通过地理上的便利增强佛教对于百姓的吸引力。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距离越近的寺院越便于他们频繁出入,这种特定区域内的信仰认同和归属使得生活在这一区域中的人群往往只祈求其居住区普遍信奉的神灵庇护,故而这些寺宇成为了一个社区活动的重要节点。而反过来,寺宇出于吸引更多人前往、方便社区活动这样的目的,也通常设立在居民往来密集、交通便利之地。

明清时期兰州城内的寺院大多修建于城市北部和东部地区,这是由于在明代兰州城北部地区主要由肃王府占据,故而逐渐发展成为了明代兰州城的中心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大,为佛教信仰提供了有力的信仰群体。清代,虽然城市范围有所扩大,但是城市的北部、东部和东北部这一区块作为地区行政中心的地位并未发生改变,交通便利,往来者众多,尤其是商业活动集中的贩售店铺也集中于此,这样的城市布局使得城市人口整体向东北部流动,由此繁盛了附近的寺院,而经济活动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佛教建筑的修造与扩大。故而这一区域能够继续为寺院的繁盛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员保障。而庄严寺在明清两代作为僧正司的所在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维护,这其实也反映出封建社会发展背景下统治阶级作为外在的人口因素对于佛教寺院的影响。

同样的,寺院选址中的人口因素理论也可以用于说明何以在清代,对于北山白塔禅院建筑群的修造远远多过对于五泉山寺院建筑群的修造。由于在明代时,北山位于兰州城外的黄河以北,又有出于军事目的而设置的金城关阻隔其下,能够前往北山的人口数量可想而知。而到了清代,随着兰州省会地位的稳固,北部地区不再受到战事的袭扰,迁居到此的居民数量随之逐渐增加,成为了北山寺宇有力的信仰支撑者。

(二) 地理因素

影响明清兰州城市寺院分布的第二个因素是地理因素,在这其中其实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利用地理因素发挥出信仰空间的精神吸引力,即“扬长”;另一方面,则是尽量避免消极的地理因素对信仰空间制造的影响,也

就是“避短”。

1. “扬长”。一方面,城内的寺院大多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地区,特别是一些较大规模的寺宇,更是如此。因为这些寺院往往是基于前代的旧址所建,通过历史上的发展,它们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了社区的中心,为通衢大道所环绕,具有地理上的便利。如庄严寺是明代僧正司的所在地,“在鼓楼西”^{[31]02},而鼓楼作为明代兰州城的中心,周边有东西两条大街通过,所处位置十分便利。

另一方面,大凡寺院,出于烘托宗教氛围、有利于传法修行的需要,都会在兴建时选择自然风光秀美壮丽、山水环抱、地势较高的地区,而相比较城内的寺宇,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城郊外的寺宇尤其注重这一点,大多注重选址以凸显出浑然天成、幽静古朴的环境特征。如五泉山崇庆寺,“屏山环水,自麓至巅,佛院禅房,参差缭绕”^{[29]91},加之该山泉水涓流,茂林修竹,形成了“水绕禅床左右连,萧萧古木带寒烟”^{[30]202}的独特景致,具有地势较高和环境清雅的双重优势。而白塔寺高居城外的北山上,俯瞰黄河,遥对兰州城,“地僻飞尘少,山高怪石多”,登临其上,黄河波澜壮阔的景象尽收眼底,气势恢宏,与城市相映成趣,而寺院本身又具有塔、阁、廊、亭等系列建筑,“隔水红尘断,凌空宝刹幽,……白塔连云起,黄河带雨流。”^{[31]201}反而与城市景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一处参禅赏景的圣地。

2. “避短”。虽然地处交通要道为城内提供了大量的信仰群体和信仰发展的基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寺宇成为社区中心后势必造成人口的密集,这反而会限制寺宇发展的规模,故而如何在狭小的空间内实现信仰群体的最大化,就成为了寺宇选址分布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为了应对这种困局,一些寺院开始采取区域组合的形式,以较小空间内兴建多所相同类型的寺院或是在同一寺院内供奉多种神祇的方式来吸引人群,通过区域分布上的组合来发挥信仰集群效应,从而与周边较大规模寺宇进行信仰群体的竞争。

试举一例来看。据史籍记载,在城南五泉山崇庆寺后有一座不知名的小庵,明人有诗:“东龙口底树穆穆,树伏深沟闾小庵,指问寺僧都不说,旁人云是女精蓝。”^{[32]173}可见,这里是一座供

女性出家者居住的佛教寺院。一直到了清代时,在这一地区才又增加了东堂、中堂、西堂这三座规模较小的尼庵^{[20]103}。之所以在此出现了新建的女性寺院,大抵是由于传统社会对于女性出家所抱有的普遍反对态度和官方对于女性出家的重重限制,以女性信佛群体为中心的佛教寺院在明清时期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无法与传统意义上的僧寺相比,故而在一个较为固定的区域内分布多所规模较小。而具有相似成分的寺院集中连片分布,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吸引女性信众前往参拜,从而扩大其对于女性信仰体系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同时增强此类寺院在区域中的竞争力。

同样也是出于增强寺院竞争力的因素,一些较为偏僻的寺院开始突破传统的单一佛教信仰体系,围绕寺院建筑多种宗教信仰杂糅的信仰空间。自五泉山向西为龙尾山,由于明正统时(1436-1449)在此兴建佛教寺院华林寺而逐渐更名为华林山,此后,明、清两代又在此处兴建了大量不同类型的寺宇,如八蜡庙,“在古峰山(即华林山,引者注)华林寺西”^{[33]508};玄帝宫,“左有三皇殿、北斗宫、张仙祠,上有三清殿”^{[22]81};关帝庙,“与华林对峙”^{[22]81};太清宫,“下为关帝庙,上为三瀆骏,又上为文昌宫”^{[22]102};阿公祠,“华林山前”^{[33]511}……此外还有洪厂寺、握桥寺、文昌宫、老君庵、上帝庙、火祖祠等,这些道教宫观和民间祠庙分布密集,类型多样,在此地形成了以道教文化为主,佛教和民间信仰为辅助的新型文化区。

(三) 历史因素

回顾明清时期兰州的城市寺院分布,有很多大规模的核心信仰空间是在旧有寺院的基础上修造而成的。如嘉福寺,“唐贞观九年高昌王建……元至元间重建……国朝康熙初毁于火,重建之”;庄严寺,“唐初建,元至元间重修”;普照寺,“唐贞观间建,明永乐间肃藩重修”^{[22]103}。对于这些寺院而言,其中的历史因素占据了很大的成分,百姓大多已经接受了口耳相传的信仰核心空间,这对于寺院的发展无疑是最为简单有效的途径。

而对于一些新建寺院来说,则更多地表现出

相同属性的新旧寺宇集约布局的特点。如位于五泉山的崇庆寺。原有的崇庆寺于明洪武五年(1372)敕建,其旧有建筑主要依山而建,到了清康熙七年(1668)时,又在寺东修建地藏庵、五龙祠、卧佛殿、观音殿,寺西建燃灯寺、慈母宫、藏经殿、嘛呢寺,形成了以崇庆寺为中心、东中西三路并存的佛教寺宇群,“梵刹仙居,俱成佳境”^{[22]92}。此后,在城南区域又新建有惠泉寺,在红泥沟口;卧桥寺,在握桥西;洪厂寺,在上沟;槐荫寺,在西园;新园寺,在金天观南;西津寺,在下西津桥西;长庆寺、报国寺等一系列小型寺院,这些寺院沿山而修,绵延数十里,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佛教建筑集群。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方面,相同属性的寺宇在信仰对象和信仰内容上容易产生共鸣,这在客观上为同类寺宇的布局提供了可能性,而另一方面,新旧组合型的布局方式既为旧有寺宇的恢复新修提供了保证和后备支持,更为新建寺宇带来了更多的潜在信仰群体,这在北山慈恩寺的修建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旧有的白塔禅院本来已经是明代兰州城外影响很大的寺院,经明末清初的战争后“廊庑不具,僧徒绝迹”,而通过在白塔禅院西新修慈恩寺和金山寺,“为之买地置磨……招僧居住”,最终实现了白塔禅寺与北山慈恩寺、金山寺“琅函碧磬,暮鼓晨钟”^{[22]186}①的局面。

还有一些寺宇通过塑造神应故事来吸引信众。相传清康熙时有僧人,在史籍中称其为“华严僧”,因“山径陡仄,寺僧莫肯居”,这位僧人得以独居在五泉山千佛阁,每日持诵《华严经》。后来,华严僧入灭,山下的人家知道后,将其埋葬在千佛阁附近的山罅中,“自是阁无居者”。然而此后,居住在山下的僧人发现山上的钟鼓会在每天早晚自然鸣响,不知其中缘故,日日惊惶,直到在邑生的指点下,“书《华严经》一部瘞于罅中,立石镌‘大方广佛华严经’七字,钟鼓遂不复鸣。”^{[22]213}在此处,华严僧人的故事不仅增强了佛教本身具有的神圣色彩,更是将不可能发生的历史事件加诸其上,“创造”了一个合理的历史因素,从而赋予了五泉山千佛阁深厚的佛教蕴涵。

①清人长白绰奇撰《修建北山慈恩寺碑记》记载此事,该文亦收录于《兰州古今碑刻》一书中。

(四) 风水因素

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在选址时还往往会考虑到传统的风水理论，利用建筑构成某些特定的风水形势，以达到增强风水优势、弥补风水缺憾的作用。

明代兰州城西北的嘉福寺内有十三层木塔，曾毁于元末战火，明清时进行了多次重修，木塔得以重新耸立于此，而这对于风水的影响也得到了时人的肯定：“今塔则巍巍，一柱八面玲珑，上应乾天，前迎巽位，千峰环拱，九曲滌洄，有裨益于风气山川，实非纤细。”^①认为通过在城西北方修造木塔，补齐了在五行中属木的巽位，从而在兰州城构成了完备的风水体系，对于调和城市阴阳气数具有重要的价值。

同样，明代在北山修建白塔禅院、清代又在此修建慈恩寺，也有出于风水的考量。在绰奇所书的《修建北山慈恩寺碑记》中明确写道：“昔有白塔禅院……上塑地藏像，下建玉皇阁，盖取易地天泰之义也。又按形象言，北山乾方，而黄河带其下，南面皋兰，列为屏几……故高塔建其上，耸入云表，类文笔之点砚池焉。”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人认为通过在北山上修建寺院和白塔来象形文人所用之笔，而用山下的黄河和城北的皋兰山象形砚池和几案，以此构成风水格局，有促进城市文脉的作用。而对于在北山上增修慈恩寺、文昌宫、魁星阁等建筑，长白绰奇也认为此举可以使之“与都城相映带……使之卓然特立”，有助于“培护文峰，以期贤俊辈出”^②。

从传统观点来看，佛教追求四大皆空，并不主张堪舆风水之类的相术，然而在清代却出现了利用佛教建筑改造风水的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佛教和道教融合的趋势，二者不再是以往针锋相对、非此即彼的对立局面，佛教寺院开始逐渐吸纳道教中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更容易为百姓所接受的风水理论，并通过修建佛教建筑，将这些理论进行了实践，以此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支持和认可，从而也为扩大佛教信徒和寺院收入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结语

其一，回顾从明至清兰州城内寺院的分布，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寺院的数目在逐渐增加，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一方面固然与明代的相关史籍存世数量较少的客观原因相关，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与清代兰州城市地位的提高密切相关。兰州在明洪武初时被降为县，属临洮府，成化十三年（1477）时复为兰州。清初，兰州仍延续明代的行政归属，为临洮府所管辖，康熙五年（1666）甘肃巡抚移驻，乾隆五年（1740）临洮府治移至兰州，改称“兰州府”，兰州作为一省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正式确立，这就为清代城市信仰空间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持。

而随着大量人口的迁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兰城百姓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个中缘由，在道光时期编纂的《兰州府志》中有非常明晰的解说：“大抵兰属本皆边地，自建设会城以来，四方冠盖相属，附郭之地渐染，以熟曰趋于文。”^③可见，城市地位的转变有力推进了城市的文明化进程，百姓对于信仰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而这也成为了城市佛教信仰空间得到大规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通过前文中所述对城市寺院选址的影响因素，可见在明清时期兰州城市的信仰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影响。客观上，无论何种信仰空间，都受到人口数量和地理空间的限制，而信仰空间的发展需要较多的人口作为支撑，这就意味着其势必需要坐落于交通通达、人口聚集的区域。而人口聚集的区域虽然为寺院的发展提供了信仰基础，但是有限的土地又限制了寺院发展的规模，故而从大多数情况来看，这二者实际上表现出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特点。主观上，各类信仰空间的分布则更多地考虑选址区域的历史因素和风水因素，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清时期兰城百姓对于信仰活动主题的推崇。这些选址区域或是旧有寺院，或是与历史事迹相关，或是与风水

① 清人陈如稷撰《创建金城嘉福禅林宝塔毗卢阁并左右楼诸处碑记》记载此事，说康熙时巡抚巴公、叶工按府索公等官员出资，与檀越一起出资重建毁于火灾的嘉福寺宝塔，又建毗卢佛阁五楹、左右楼各五楹，历时三年完成。

效应相关,但都可以被认为是神灵活动的承载地,通过构建这样的信仰空间,将信仰艺术和主题充分应用到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体系中,有助于将信仰本身变得更加具有可信性,从而吸引更加广泛的受众群体和经济支持。

第三,通过对于明清时期兰州城信仰空间的分布和选址因素的梳理,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城市信仰空间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信仰空间并非独立固守于某一区域中,而是呈现出多重层叠、交互作用的形态,在佛教寺院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诸如“文昌”“奎文”“酒仙”“慈母”等宫观建筑,尽管它们在建置上仍旧从属于原有的寺院建筑,但它们的建造无不宣告着道教、儒家和民间信仰对于寺院原有建筑体系和信仰体系的浸染。也正是源于此,佛教寺院在职能上,也开始表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它们不仅是具有宗教信仰功能的建筑,同时还开始兼具娱乐、社交等多种职能,不仅为城内的官员和百姓提供了郊游玩耍、以文会友的绝佳地点,甚至成为了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如前文所说的普照寺,由于其地处城市中心,受到地理上的限制因素较大,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改扩建,“苏四十三事件”后,寺院建筑也长期未曾得到修复,到了清后期,其东西两侧逐渐被周边市民占据,“循大雄殿东西各建为市尘,中以长廊连之,则使商贩市鬻就列为肆”^{[2][24]},寺院面积由此缩小,周边建筑逐渐脱离寺院归属,成为兰州市民从事日常买卖和交易的中心。

第四,正是由于这样的职能多样化特点的出现,寺院这一佛教信仰空间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单一信仰功能的个体,原有的纯粹宗教信仰内容逐渐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多元化、多层次、多内涵的复合信仰内容,原始的宗教

信仰也就此走下神坛,开始走入百姓生活,变得更加具有世俗化的倾向。相较于明清时期如杭州之灵隐寺、嘉禾之天童寺、南京之大报恩寺等江南巨刹,整个明清时期的兰州城市寺院,见于史册的佛教活动也只是围绕在对于寺院的修造上,并未未来过具有较高佛学造诣的高僧大德,也没有如刻经、请藏类的佛教活动开展。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清时期兰州城市经济发展滞后,类似刻经、请藏这样的工程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这在明清时期的兰州城是非常难以开展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从整个明清时期佛教的发展态势来看,归隐山林、潜心梵修的僧人数量越来越少,佛教本身发展不济,而本地又无法诞生出对于佛教有更高精神阐释的僧人,再加之明清时期兰州城市佛教寺院的影响力几乎只辐射于兰州一地,并没有扩大到兰州城之外较远的地区,具有佛学造诣的高僧大德也很难到此传道授业讲说佛法,这就进一步导致了百姓对于佛教的认知仍然停留在施金建寺、烧香拜佛上,并没有产生出新的更高的精神追求。而佛教寺院为了尽可能多地吸引信众,只能通过兴建更为气势恢宏的建筑和增添更加精美的造像、壁画,甚至是在寺院中供奉其他宗教神祇等简单易行的措施与百姓进行互动,这样实际上又反过来推动了佛教发展的进一步世俗化趋势。

也正是在这样的共同推动下,原有的佛教信仰空间和信仰内容与新加入的信仰空间和信仰内容相互作用,共同构造出一个复杂的、广域的信仰空间和更加丰富多样的信仰内涵,并以此为中心,逐渐构建出整个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多元而广泛的信仰体系,塑造出城市人口日渐世俗化的信仰内涵。

参考文献

- [1] 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兰州市志·民族宗教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 [2] 郭厚安,陈守忠.甘肃古代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
- [3] 邓明.兰州史话[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
- [4] 安守仁.宋兰州城与明兰州卫所[G]//金钰铭.兰州历史地理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268-272.
- [5] 梁德辉.兰州历代建置沿革[J].兰州学刊,1980(1):79-80.
- [6] 赵一匡.明清时期的兰州府(上、下)[J].兰州学刊,1984(1):89-92;1984(2):84-89.

- [7] 赵世英. 兰州旧城兴废始末探识[J]. 兰州学刊, 1988 (5): 96-100.
- [8] 邓明. 兰州军事地名考释[J]. 档案, 2001 (6): 19.
- [9] 党瑜. 论兰州城址的历史变迁[J]. 唐都学刊, 1996 (2): 82-85.
- [10] 党瑜. 试论兰州市地理环境与城址的历史变迁[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0 (2): 143-154.
- [11] 牛晓燕. 清至民国时期兰州城市发展与地域影响[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08.
- [12] 李清凌. 明代西北的佛教[J]. 甘肃教育学院学报, 2001 (2): 64-69.
- [13] 宋法仁. 明肃王对兰州的贡献[J]. 甘肃社会科学, 1993 (4): 105-108.
- [14] 朱元璋. 三教论//钱伯城, 主编. 全明文 (1)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46.
- [15] 介永强. 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4.
- [16] 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 (2): 嘉靖陕西通志: 卷三十六[M]. 北京: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复制中心, 1997: 146.
- [17] 何孝荣. 明代南京寺院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
- [18] 明太祖实录: 卷二〇九[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3109.
- [19] 葛寅亮. 金陵梵刹志: 卷二[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63.
- [20] 中国地方志集成: 甘肃府县志辑 (15): 乾隆皋兰县志: 卷十二[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 [21] 张维. 兰州古今注[M]. 兰州: 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 1943.
- [22] (乾隆) 甘肃通志: 卷十二[M]. 台北: 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557), 1983.
- [23] 薛仰敬, 主编. 兰州古今碑刻[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
- [24] 张维. 陇右金石录: 卷六[M]. 兰州: 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 1943.
- [25] 蒋薰. 留素堂诗删: 卷五[M]. 北京: 北京出版社四库未收书辑刊: 第7辑 (19), 1997.
- [26] 阿贵. 钦定兰州纪略: 卷六[M]. 台北: 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62), 1983: 311.
- [27] 锡慎. 退复轩诗: 卷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 (1554), 1995: 121.
- [28] 梁章矩. 楹联丛话: 卷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 (1254), 1995: 60.
- [29] 中国地方志集成: 甘肃府县志辑 (15): 康熙兰州志: 卷一[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91.
- [30] 黄谏. 五泉[G]. 中国地方志集成: 甘肃府县志辑 (15): 乾隆皋兰县志: 卷十九.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202.
- [31] 李文. 白塔山寺[G]//中国地方志集成: 甘肃府县志辑 (15): 乾隆皋兰县志: 卷十八.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201.
- [32] 赵用光. 苍雪轩全集, 卷六[M]. 北京: 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丛刊 (182), 1997: 173.
- [33] 中国地方志集成: 甘肃府县志辑 (1): 道光兰州府志: 卷四[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Factors of Religious Space Distribution and Site Selection: A Case Study of Urban Temples in Lanzho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QIN Yi-ran^{1,2}

(1.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y, Aichi University, Nagoya 4610003, Japan)

Abstract: Chec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ime and space, the urban temples in Lanzhou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temples within the city in the Ming, the temples within and out of the city in the Qing. Their site selection was affected to varying degrees by population, geography, history and geomantic factors. Since urban temples are Buddhist belief space, their distribution and site selection hav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from which we can see the expansion of urban belief space and function as well as the tendency to secularization of people's belief in the two dynasties.

Key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anzhou; urban temple; site selection factors; belief space

(责任编辑:寇 甲)

163